

西學之子

——容閔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

陳瑋芬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前言：異域、跨界、認同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日本經歷了漫長的海禁，彷彿百年沈睡有待甦醒。兩位東方平民迫不及待打了前鋒，他們分別由香港及箱館搭船橫渡重洋抵達美國求學。當時的美國正向外大舉擴張領土，國內南北爭戰頻仍。然而作為「蛇首」¹的新英格蘭地區人文技術薈萃，在該地林立的數所大學，歷史均超過百年²。

兩位東方人分別是出身中國廣東省的容閔（原名光照，字達萌，號純甫，1828-1912）和出身日本江戶安中藩的新島襄（幼名七五三太，元服得名敬幹，1843-1890）。前者於一八五四年獲耶魯文學士學位，是第一位取得美國大學學位³的華人；後者自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理學科畢業後，一八七四年獲安道佛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授與神學碩士學位，是日本留美學生中第一位取得研究所學歷的人。

長壽的容閔見證了清末到民國的改朝換代，而新島雖未活過半世紀，也見證了幕末到明治前二十年的思潮激變。作為第一位離脫母國傳統，親炙西方文明的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95-2411-H-001-098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曾在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座談會公開報告，又承蒙《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二位審查人對本文提出非常寶貴的意見，均已在修訂中參酌並大幅改正，敬申謝意。

¹ 美國國父富蘭克林所繪漫畫，以蛇代表美國早期十三州聯合體，新英格蘭被喻為蛇之首。

² 長春藤八校除康乃爾大學外，其餘七所均創立於十七、十八世紀，美國獨立革命之前。

³ 一八七六年耶魯主動授與他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東方人，有研究者以「邊緣人」⁴來定位他們，意即處於兩種文化交界，遠離某一文化中心，在認同另一文明形態的同時，身處的現實環境又不斷提醒其本土背景，因此在文化歸屬感上出現兩歧性，既完全接受另一種文化，民族情感又越發強烈。美籍華人許烺光具體地以文字自述「邊緣」境遇的兩難：

我是一個「邊緣人」。我出生並成長於一種文化環境中——在那裏，生活停滯，大部分人的生活幾乎完全可以預知，後來我被從這一文化中趕了出來，到另一種文化中生活和工作。在後一種文化中，人們渴望變化，因為它本來就追求進步，萬物與眾生的面貌總是變動不居的。處在對比如此明顯的二種文化環境中的人，本來就徘徊於每種文化的邊緣。他自己就像是漫步於這兩種文化邊緣上的兩個人一樣，時常接觸……。⁵

外在環境由習慣轉未知、傳統而創新，個人處境則被推向「邊緣」，跨界到異域的體驗，產生內在對自我和他者認知、認同的模糊。「邊緣」帶有反社會或為社會所反的意思，同時也具備「有別於主流」、「另類」的意思。容閔完全偏離了中國教育制度的主流——科舉——的道路，新島襄也偏離了傳統武士、武家社會的規範，選擇傳教在當時的日本社會幾乎接近最邊緣最底層的職業。他們都可以說是本國社會中的邊緣人，而處身美國，又是黑髮黃膚的外人，他們不甘心自我被邊緣化，終生的作為似乎都顯現著抗拒被邊緣化的努力。他們同時也是「夾縫」之人——處在東方和西方的夾縫中、前近代和近代的夾縫中、宗教和家國認同的夾縫中、公意與私情的夾縫中。「夾縫」有如一個臨界位置，兩界互交，製造了夾縫的存在空間。當介入兩種有衝突和對立的文化時，在價值觀或行為規範上產生隔膜，在兩種文化的磨擦下也遭受情感折磨。

他們在西方人眼中是徹頭徹尾的愛國者，與傳統文化人卻有所不容。在個人選擇上，兩人對是否改名、是否接受美國籍、是否與西方女子聯姻以及是否終生傳教等事上頭，做出迥異的判斷，而在教育救國的原則裏，容閔奏議將中國幼童送出國門，遠赴工業革命的競技場鍛鍊和學習，新島則躬身在日本播下基督教的

⁴ 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4。李細珠：〈「邊緣人」的角色尷尬——容閔在晚清中國的人生境遇〉，收入吳文棻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廣州：珠海出版社，1999年），頁177-189。石霓：〈中國留學生之父——一個孤獨的邊緣人〉，收入吳文棻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頁190-231。

⁵ 許烺光：〈自序〉，《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比較》（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頁3。

種子，以西方思維教育同胞。

這兩位西學所造之子，不僅親身目睹近代中、日的榮辱興衰、國勢消長，也是推動東方西化的內在動力之一。他們近年重新在中日兩國分別受到關注，所遺留的歷史碎片藉由書信、照片、日記、自傳而逐步受到拼貼。先行論考多半聚焦在容閔之「愛國」和新島之「傳道」來推崇他們的貢獻，本文希望在充分關照既有成果之下，進行二者的比較研究。即取異域、跨界和認同的主軸，透過二者外在內在歷程的省察，凸顯出異國經驗如何造成「邊緣」、「夾縫」的處境，他們如何重新取得有效的發言位置，原生的使命感和政治立場又如何透過個人體驗產生漸變。最後將二者置於中、日留美學史（參見「附錄」）予以定位，並考察二人在中、日的現代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異域——東方與西方

容閔和新島襄都對西方具備一定程度的認同，懷抱著真摯的基督教情懷，可以算是「西化」了的東方人。「西化」，是一種隨文化接觸而起的變化。汪一駒闡釋「西化」道：

當我們說：某一中國人「西化」了，並不意味著這位中國人已經真的變成了西洋人。相反的，是指因為其西方經驗，他已經脫離了中國的典範，換言之，西化的結果很可以說是一種行為式樣，多少帶點中西文化痕跡，但卻又不中不西。⁶

容閔與新島襄在早年的文化養成中，便命定又自覺地走在與眾不同的道路，終於成為逸出群體的異數。容閔身處澳門這一中西文化的交會之地，透過傳教士和教會學校學習西學，遠離「儒學取士」的傳統中國文化人出仕之道。新島身為武士子弟，別無選擇的接受武士教育，卻經由閱讀而嚮慕西學、基督，他預見強勢的西方文明勢必凌駕於傳統文化之上，在出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理智上、道義上的一切興趣和情感都認同了西方。

心理分析認為，早年的「渴望」與「尋找」是後來思想的濫觴，因此本節將由兩人早年的思想形成著手，查考他們由「東學」而「西化」的線索。

⁶ 汪一駒著，梅寅生譯：《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91年），頁xvi。

(一) 從澳門到紐約

一八二八年，容閔⁷出生於廣東南屏村。父容明冠，母林蓮娣，家務農，容閔上有兄姐三人，下有一弟。七歲進入郭實臘 (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夫人瑪麗在澳門⁸所設的「西塾」⁹，學習英文、算術、圖畫、《聖經》。這個看來是為了兼顧家計的舉動，開啓了清朝選派幼童留美之破天荒事件。容閔自己認為這是主耶穌的安排：

至於在我後來的生活中終於發生的結果和一系列的事情，都完全聽任於上天的旨意。¹⁰

容閔因家貧而得風氣之先，打開面向西方的眼界。然而一八三九年夏，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中英開戰。學校停課，容閔輟學。一八四一年，英國傳道會的合

⁷ 關於容閔的生平記事，筆者所見有下列傳記資料。容閔在美國出版的自傳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09)，最早由徐鳳石、惲鐵樵用「新民體」節譯為《西學東漸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其後收入《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重新點校並增補容閔的〈自序〉和杜吉爾牧師的演說。容閔著，王蓁譯：《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張文驪：《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閔》(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石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都直接譯自容閔英文自傳。石霓另有《容閔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及前註英文菜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都補充了許多珍貴而深入的研究資料。日譯本有百瀨弘譯注：《西學東漸記 容閔自傳》(東京：平凡社，1969年)。其餘英文相關研究有 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3); Kenneth Sch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⁸ 當時澳門已淪為葡萄牙殖民地，許多教會機構在此設校。當容閔來到澳門，眼前所見十分陌生，海港裏各國帆檣如林，大火後殘存的大三巴教堂的牌坊巍然佇立，碼頭上隨處可見來自異國的水手、牧師……。

⁹ 容閔敘述道：「哥哥照例進了正統的儒家私塾讀書，……父母偏偏要送我去上洋人的學校，這實在令我大惑不解。……〔畢竟〕在中國只有一條途徑——中國人所狂熱崇拜和追求的——科舉取士——通向高官、勢力、權力和財富……」(石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頁1-2)。他認為父母此舉或許是看見南方和外國人的來往日益頻繁，會說英文或許能謀一份收入不錯的差事，僅此而已。郭實臘夫婦相關研究可參見：Tony Lambert, "The Gutzlaff Affair: A Warning from History," in *China Insight Newsletter*, July/August 2004, (<http://www.us.omf.org/content.asp?id=37216>)。

¹⁰ 石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頁2。

信醫師 (Dr. Benjamin Hobson) 受郭實臘夫人所託，領他到香港「馬禮遜學校」¹¹ 復學，課程涵蓋英文寫作、地理、聲樂、幾何、歷史，兼有《四書》、《五經》¹²。

一八四七年，十八歲的容閔闊別家人，與同學黃寬、黃勝隨同鮑留雲牧師 (Rev. Samuel Robbin Brown, 1810-1879)¹³ 搭上滿載茶葉的女獵人號 (The Huntress)，由黃浦江經香港，過好望角，駛向紐約¹⁴。

當時的美國是個建國七十年的年輕共和國，紐約人口不過三十萬。容閔一行由轉乘小船到新港 (New Haven) 面見耶魯大學校長 Dr. Jeremiah Day (1773-1867)，搭火車到東溫莎 (East Windsor)，由鮑留雲的岳父巴勒特 (Rev. Shubael Bartlett) 帶領參與第一場安息日禮拜。隨即前往斯普林菲爾德 (Springfield) 的孟松中學 (Monson Academy)，成為該校的第一批中國學生。容閔借住在鮑留雲之母家中¹⁵，在她溫暖澄淨的人格感召下固定上教堂，認識親近基督，最後受洗為基督徒。

孟松的課程涵蓋算數、英文文法、生理學和心理學。一九四九年，容閔和黃寬完成中學學業，後者轉往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醫科，前者進了耶魯，兩度拒絕教會資助，在食堂和圖書館打工，賺取生活費。他成績不算突出，但持續刻苦地學

¹¹ 馬禮遜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洋學堂，詳見李志剛：《容閔與近代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81年）。免學費，學生家境多半貧困。容閔就學六年。（石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頁4）。

¹² H. N. Shore 在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野鴨的飛翔）(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1)一書中，曾根據鮑留雲一八七七年九月在天津演講，生動地描述容閔就學的情況。

¹³ 鮑留雲畢業於孟松、耶魯，任職紐約聾啞院。一八三八年獲紐約協和神學院神學博士學位，奉派至澳門馬禮遜學校任教。與巴勒特牧師之女伊莉莎白 (Elizabeth G. Bartlett) 結婚後同赴中國，寄宿衛三畏 (Rev. Williams Samuel Wells) 家，學習中文，並開辦香港馬禮遜學校。一八四七年初因妻病返美時，攜容閔等三人留學。一八五九—一八七九年在日本辦學、翻譯及傳教。是「日本亞州學會」的創始人，也促成日本首批學生留美，人謂「新東方的締造者」(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¹⁴ 該船所屬奧立芬兄弟公司 (The Oly-Phant Brothers) 資助容閔等人的船費，學費則由蘇格蘭商人康白爾 (A. A. Campell) 與《香港中華日報》(*China Mail*) 主筆 Andrew Shortrede，及美籍商人李企 (A. A. Ritchie) 資助。參見容閔著，王蓁譯：《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頁12。

¹⁵ 「鮑留雲牧師的母親……負責他的英語學習，容閔需要步行去學校，回來吃午飯，下午返回學校，再回來喝下午茶，再返回學校。不過這對他來說是非常好的鍛煉。」（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白彬莉 (Beatrice S. Bartlett) 口述，摘自《幼童·五集電視紀錄片》第一集（深圳：深圳音像公司，2004）。

習，是「兄弟會」會員，曾經兩次獲得英文寫作首獎。

大一，他剪長辮蓄西髮、易馬掛著西裝¹⁶。大二，他入美籍，加入公理教會。積極學習西方文化，也持續關心中國問題，數次在美國報章撰文，所流露的「經國之才」頗受美國人士賞識¹⁷。他認識到保守專制帶給家園的災難，說：

因為知識增加了，人的道德、考慮的範圍也就廣泛了。我自己想到中國的老百姓這麼樣的痛苦、受那麼大的壓制。我沒有受教育之前，一切都不知道，我就是自己過日子，我接受了教育以後，我覺得這種情況是不能忍受的。我自己現在得到了教育的機會，我就應該使我的同胞，早一點擺脫這種處境，我要為他們服務。¹⁸

他不間斷的思考那一種職業最有益於祖國，寫信給衛三畏，論及個人去向和國家前途的關連。他說：

關於我的職業，我尚無決定。但有一事可確定，我將去學農業化學，也可能去學內科和外科醫學。對於一個決心為國家效力的人來說，各種不同學科，都是一樣重要。分門別類，因此實在難於抉擇。¹⁹

也許是在深思熟慮後意識到，要使中國通過現代化而富強起來，個人的力量何其有限，因此他始終沒有跨入上述任一學門，而把眼光轉向更多的青年，希望能幫助中國孩子接受西方先進教育。他說：「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²⁰

一八五四年，容闈取得耶魯學士學位 (B.A.Degree)。在畢業留言簿裏，他自勉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他的美國同學期許他道：「我等待聽聞你在未來中國歷史上進行偉大事業的消息。願你回到你的國家時，發現它已成為神聖的共和國。而你將共享參與推翻專制王朝後勝利的喜悅。」²¹

他循著來時的航路踏上歸途，也最終實現了自己在耶魯的夢想，策劃和實施

¹⁶ 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年），頁15。

¹⁷ 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頁58。

¹⁸ 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主編）口述，《幼童·五集電視紀錄片》第一集。

¹⁹ 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所書。出自高宗魯先生提供的英文未刊手稿，由耶魯大學收藏。文字可參見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頁57-58。

²⁰ 容闈：《西學東漸記》，頁62。

²¹ 《幼童·五集電視紀錄片》第一集，該畢業冊檔案保存於耶魯大學 LSF Library。

了中國首次派遣幼童出洋留學的計畫。然而他絕沒有預料到，到這個理想真正落實之前，竟然需要足足蟄伏十八年。

（二）從箱館到波士頓

容閔自耶魯畢業返國那年，閉關自守的日本終於打開國門。卻由於渡航解禁令並不適用留學生及商人，所以在容閔返國整整九年後，日本才出現第一位留美學人，而且他必須克服死刑的恐懼違抗幕府禁令，偷渡踏上留學之途²²。

一八四三年，新島襄²³生於江戶安中藩，父新島民治是為武士，母とみ，上有四姐、下有一弟。五歲習書法²⁴，十歲入安中藩學問所，跟隨添川廉齋學習漢籍古典，以及劍術、馬術。十三歲依藩主之令，隨田島順輔、手塚律藏學習蘭學。十四歲元服，擔任安中藩文書輔佐。十五歲有感於世事紛然，國家將有大亂，以漢文書信上呈藩內家老尾崎直紀，謂：

日本騷動紛然將有亂，若及亂，敬幹不能學書。今不學恐失時，宜使敬幹入塾開矇目，是僕之以赤心所願也。²⁵

面對黑船叩關 (1853) 及江戶大地震 (1855) 等國內外劇變的焦躁和危機感，表露無遺。十六歲在安中藩學教授書道，卻一度企圖逸脫武士規範，入蘭學塾求學。此舉遭受藩主責打²⁶，他則滔滔闡述了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必須透過西學知已知

²² 日本的海禁政策雖然終於一八五三年，然而要到一八六六年，留學生及商人才適用於此渡航解禁令，換句話說，一般人民必須「脫出」（偷渡），才能留洋。

²³ 關於新島襄的研究，筆者所見者有如下資料。井上勝也：《國家と教育——森有禮と新島襄の比較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00年）；太田雄三：《新島襄——良心ノ全身ニ充滿シタル丈夫》（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年）；湯淺與三：《新島襄傳》（東京：改造社，1936年）；森中章光：《新島襄先生の生涯——教育報國篇》（東京：泰山房，1942年）；新島襄：《人生讀本》（東京：第一書房，1938年）；根岸橋三郎：《新島襄》（東京：警醒社，1923年）；學校法人同志社編：《新島襄：近代日本の先覺者》（東京：晃洋書房，1993年）；同志社編：《新島襄——その時代と生涯》（京都：同志社，1993年）；武田清子、吉田久一編：《新島襄集》（東京：筑摩書房，1977年）；本井康博：《新島襄の交遊》（京都：思文閣，2005年）；北垣宗治編：《新島襄の世界——永眠百年の時点から》（京都：晃洋書房，1990年）；岩村清四郎：《新島襄言行錄》（東京：三省堂，1939年）。

²⁴ 新島之父在安中藩任祿筆職，並在家開辦書道塾。參見太田雄三：《新島襄——良心ノ全身ニ充滿シタル丈夫》，頁14。

²⁵ 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三卷（京都：同朋舍，1983-1996年），頁5。

²⁶ Arthur Sherburne Hardy (哈蒂之子), *Life and Letters of Joseph Hardy Neesima* (Boston and

彼的信念。十七歲獲選為藩主護衛，前往幕府軍艦教授所學習數學及航海術，在江戶灣岸見荷蘭軍艦，驚其偉容，嘆息國力落差。十九歲入甲賀源吾的洋學塾，並搭乘洋式帆船，航行至備中玉島。二十歲閱讀日譯《魯賓遜漂流記》，驚訝於世界上存在著與幕藩體制截然不同的國家體制，個體得以自由自立；又熟讀傳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所著中文本《聯邦志略》，對美國的史地、政治、經濟、文化有所瞭解，衍生脫離封建桎梏，爭取自由的念頭。十九世紀前半的日本，約有八百種基督教出版品來自中國²⁷，新島雖處於嚴厲禁教的時代，仍私自爭取閱讀中譯《聖經選錄》等的機會，在其中感受到天父慈惠，也對西方文物，尤其是基督精神產生莫大嚮往²⁸。

二十一歲，他搭乘快帆船由品川沖出帆往北行，經興津、霜風呂，抵達北海道箱館。先寄宿於俄國領事館副司祭尼可拉之家，擔任日語教師，並隨俄國士官習英語。一個半月後，得到英商店鋪雇員福士卯之吉的斡旋，夜半秘密換乘由美籍商船柏林號 (The Berlin)，前往上海。出發前他作漢詩表達四方之志：

一襲弊袍三尺韌，回頭世事思悠悠。男兒自有蓬桑志，不涉五洲都不休。²⁹他在航程中自行剃去髮鬚，改蓄西髮。在上海轉搭泰勒船長 (Capt. Horace S. Taylor) 的荒野漫遊號 (The Wild Rover) 到香港短暫停留。他購入中譯《聖經》³⁰，又得泰勒贈予英譯《聖經》，以及一個來自《聖經》的名字：約書亞 (Joseph)³¹。隨船至東南亞進行貿易，一年後 (1865年7月20日) 才跨越大西洋抵達波士頓港。他拜訪柏林號船主哈帝 (Alpheas Hardy, 1815-1887)³²，傾吐欲在美接受良好教育的心願，在波士頓航員大廈填述的入境理由是「欲讀懂英文《聖經》，深入認識耶穌基督」³³。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1902), p. 4.

²⁷ 小澤三郎：《幕末明治耶穌教史研究》（東京：亞細亞書房，1944年），頁157。

²⁸ 井上勝也：《國家と教育——森有禮と新島襄の比較研究》，頁77-80。

²⁹ 同志社編：《新島襄——その時代と生涯》，頁19。

³⁰ 新島偷渡時隨身攜帶小刀兩把，一把贈與船長，代替船費，另一把換得八元，購買《聖經》。

³¹ 新島襄在當日（1864年7月11日）的日記上，以英文記載泰勒船長賜名時的話語：“I shall call your name Joe.” 他由《舊約聖經·創世記》所述約書亞事蹟而自覺神之使命，主動由 Joe 這個發音而姓名由「敬幹」改為「襄」，激勵他畢生的努力。

³² 哈帝夫妻對新島的關照，讓他滿懷感激。一封新島於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寫給哈帝夫人的信件裏這麼說道：“O, be cheerful to help me (a poor boy, like a wingless bird)”參見 Hardy, p. 58。

³³ 井上勝也指出新島決意偷渡，有三個原因可以考慮：(1) 逃離封建桎梏，(2) 自由親近基

哈帝協助他進入麻州安道佛 (Andover) 的菲利普高中 (Phillips Academy) 就讀，寄宿於西頓夫人 (M. E. Hidden, 1818-1893) 家中，也很受校長泰勒 (S. H. Taylor) 照顧。兩年後畢業，在安道佛神學院附屬教會受洗³⁴。升入安默斯特學院³⁵理學科，經常在春夏假期進行長途步行，時而參觀礦山、採集礦物、或遊賞風光。一八七〇年獲頒理學士學位，進入安道佛神學院，這是美國最初的神學研究所 (1807-1965)，嚴守清教教義。神學院時期的新島，受新英格蘭神學運動最後的代表者帕克 (E. A. Park) 感化尤深。研一，他透過駐美公使森有禮的斡旋，獲得日本政府發給的留學許可書，身分上不再是個偷渡者。研二在華盛頓與岩倉具視 (1825-1883) 的外交使節團見面，結識木戶孝允 (1833-1877)、伊藤博文 (1841-1909)、大久保利通 (1830-1878) 等人，兼任翻譯陪同文部理事官田中不二麿 (1845-1909) 前往視察英、法、德等國的教育制度。返國後受託撰寫《理事功程》初稿，這份報告是為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濫觴。然而他在歐洲期間身體狀況轉壞，休學半年復學，一八七四年取得神學碩士學位，並且在波士頓的弗農教會 (Mt. Vernon Church) 接受接手禮，成為神職人員。

束裝返國前，他參加在拉特蘭 (Rutland) 召開的第六十五屆美國外籍傳道人協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並致信主辦單位，自述傳教意願：

拜啓 請容我敘述我幼少時期所受的教育、基督教的體驗，以及獻身傳教的熱望。我本佛教徒，自幼深受孔子德育的薰陶。及長，前者令我感到不快，而後者讓我感到不滿足。有甚者，我對於良善之物抱持著某種願望，產生這種心情狀態時，我閱讀旅華美籍傳教士所撰寫的《聖經》歷史 (the Bible history) 中譯本，獲得撫慰，其中對於神的作為有深入的描寫，引領我冀求神的慈惠。因此我離開祖國，來到異邦。這是神的旨意，祂在波士頓為我準備了熱情的友人，資助我的教育。抵美未久，我便立意成為神的子民，讚美神的話語，求索神之光耀。我希望能把這樣的體驗傳達給我的同胞，讓他們得知神的福音。我獻身神職的動機，出於對祖國匱乏的同情，和對祖國悲慘同胞的愛。特別是對主耶穌的愛，賜給我力量。我即將

督教，(3) 在國家存亡之秋前往先進國家學習近代科學，牽引國家進行西化。參照井上勝也：《國家と教育——森有禮と新島襄の比較研究》，頁82。

³⁴ 受洗日為一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³⁵ 希利 (J. H. Seelye) 教授夫婦十分關照他，而日後希利教授曾任該校校長。

完竟學業，償清債務。在祖國時身體原本健康，來此地後稍差，但在逐日復原之中。我將暫時不會成婚，專事神職。 新島襄 敬具³⁶

這一封信，是新島清楚表白自己由佛教、儒家轉向基督教之心路歷程的重要文獻之一。會議中，他以日本必須設立基督教學校為題演講，一呼百諾，立即得到與會者熱烈迴響以及約五千美金捐款。他由舊金山搭船返回橫濱，一年後便初步落實了創辦基督教學校的心願。

三、跨界——前近代與近代

十九世紀後半葉，東亞文化圈諸國彼此相互抗衡，而對抗西力東侵的歷史也波濤起伏。容閔與新島襄在新英格蘭一待八年、十年，前者歸國時面對的是太平天國、鴉片戰爭後，清朝廷內外政局艱苦紊亂；後者則面對明治維新舉國上下的西化風潮，而政府內部並非沒有矛盾，自由民權運動方興未艾，西南戰爭一觸即發。「留美學人」這個在當時顯得不凡的榮銜，令中日兩國的外交界、政界對他倆另眼相看，然而長年離鄉背井的事實，又讓家鄉國人對他們的作為抱負感到陌生。

他們不約而同的提出「教育」為邁向近代化、富強國力之道。容閔建議選派幼童赴美求學得到認同，前後一百二十名幼童，在新英格蘭地區茁壯為飽受歐風美雨熏陶的學子，回到中國後成為礦業、鐵路業、電報業的先驅，並出現第一批把中國文化成功介紹給西方的文化人、清華大學及天津大學首任校長、最早的外交官，以及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理³⁷。新島襄則在京都創辦同志社英學校，這是第一所由日本人創立的基督教學校³⁸。他辭世後，夫人接手完成一連串的教育事

³⁶ 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六卷，頁136-137。

³⁷ 如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大學校長唐國安、天津大學校長蔡紹基，鋪建第一條中國鐵路（京張鐵路）的詹天佑等。而蔡廷幹以英文撰寫《唐詩音韻》及《老解老》，鄭其照編寫的《英文成語例解詞典》和《英華字典》，都有效地促進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瞭解。而返國後到福州船政學堂和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就學者，大都參與了中法戰爭（1884）和甲午戰爭（1894）。

³⁸ 美籍傳教士 Mary E. Kidder 於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在 James Curtis Hepburn 的診所開始教授英語，一八八九年正式定名為 Ferris 和英女學校，一九四一年再更名為橫濱山手女學院；一八七〇年，美籍女性傳教士 Julia Carrothers 也設立 A 六番女學校，一八七三年改稱築地大學，可惜一八七六年即中絕。這兩所學校就建校時間而言，較同志社稍早，但皆屬慘淡經營，命運波折。

業，並創設立同志社大學，主張大學的基礎在於人文教養(liberal education)，所以不以培育政府官員、專業學術研究者為主要目的，而重視全人教育，作育英才無數。

(一) 容閔與中國留美幼童

二十七歲的容閔以短髮西裝的模樣返抵香港時，幾乎無法以普通話言語，只得一邊學習，一邊積極尋求能餬口的工作。最初他在廣州擔任美國駐華代理公使伯駕(Peter Parker)的祕書，希望接近清朝官員而不能如意³⁹，轉赴香港擔任高等審判廳通譯，卻遭英人排擠，改任上海海關翻譯，待遇優渥。可惜四個月後，他發現翻譯人員與船主狼狽為奸、賄賂成風，不屑同流合污而求去。此後在上海、九江兩地經商約七年。由於英文文筆優美，他在上海租界有一定的名氣，自尊公允的性格則吸引了些數學家、天文學家為友。

容閔曾經說，自己在經營各種事務的同時都試圖結識能協助自己完成理想的權貴。他悲憫之餘，曾寄望太平軍：

日間所見種種慘狀，時時纏繞於予腦筋中。憤懣之極，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為正當。予既表同情於太平軍，乃幾欲起而為之嚮應。⁴⁰

一八六〇年冬，透過傳教士的引見，他在南京向太平軍提出設立軍事制度、聘用人才等建議，未獲採納，並意識到太平天國充滿蒙昧，和理想相去甚遠。

同治年間，保守的滿蒙大員中出現了一些有識之士，預見列強堅船利炮對中國的衝擊，希望通過自強，把中國引到「現代化」的道路上⁴¹。容閔搭上這個順風，一八六三年獲得曾國藩邀請至安慶會面，受聘為「出洋委員」。隔年春，赴美為江南製造局採購機器，翌年出任江蘇布政司衙門翻譯，並提出在江南製造局

³⁹ 錢鋼、胡勁草指出，「事少薪薄」也是原因。參見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頁21。

⁴⁰ 容閔：《西學東漸記》，頁70。

⁴¹ 在洋務派的努力下，從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開始，中國的某些城市出現新變化：曾國藩設立安慶軍械所(1861)、李鴻章籌辦上海江南製造局、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左宗棠設立福州船政局(1866)、崇厚設立天津機器局(1867)。一八六七年，福州城南定光寺的古剎裏，飄出幾十名孩子誦念 ABCD 的聲音，這是左宗棠和沈葆楨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完全採用西式教育，由法國和英國教習執教，思想家嚴復、海軍將領劉步蟾、鄧世昌、林泰曾，都出自這裏。

附設機械學校的建議獲得採納。

可惜古老的書桌並不容易搬動。洋務官員開辦京師同文館，準備由洋教官開設外語、天文、算學等西學內容，招收科舉出身的官員來學習。此議引起軒然大波，御史們主張必須以儒家之道培養臣民的氣節，警告同文館「變而從夷」的舉動，將會使中國拱手讓人。保守的風氣下，容閔雖曾向洋務大員提及派遣學生留學的議案，未有任何進展。

直到一八七〇年，曾國藩等人在頻繁處理涉外事物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中國由於缺乏懂得處理國際事務的洋務人才，彷彿綁手綁腳。容閔重提計畫，得到曾國藩的首肯。他喜出望外：

這個消息實在好過了頭，……猶如不眠的貓頭鷹，我感覺自己仿佛踩著雲朵，漫步於太空中。⁴²

曾國藩和李鴻章呈送給同治帝的奏摺裏指出，西方人在軍事實力的背後，還有涵蓋地理、數學、天文、製造等多元知識，把陸軍和海軍的建設，視為身心性命。中國欲仿效其成功之道，應當選拔聰穎子弟到海外留學，將皇上革新自強的夙願付諸實現。一個多月後（1871年9月9日），總理衙門接旨：「依議，欽此」。短短四個字開啓了中國的幼童留美計畫，容閔的夢想變成現實。

清廷決定每年選派幼童三十名赴美，四年共計一百二十人，學習軍事、航海、法律和建築工程，使中國人諳熟西人擅長之技，然後可以漸圖自強。學制為十五年，幼童出洋的全額費用由政府承擔。容閔請求耶魯大學校長波特 (Noah Porter) 及康乃迪克州教育局長諾索布 (B. G. Northrop) 協助幼童的住宿與學習，並傳達中國政府的原則是：必須遵循受規範的學習領域，且不允許入美籍、永久居留，或追求個人利益而中斷學業。

一八七二年，第一批幼童啓程，搭輪船走了一條不同於容閔當年的海路——經太平洋在二十五天後抵達舊金山，轉火車七天後抵達斯普林費爾德。三兩人一組，分別在麻州和康州的美國家庭寄宿。諾索布專函請託美籍教師，必須關愛照顧中國學生身體狀況，也須積極督促他們溫習中國功課、激勵他們熱愛國家。

幼童在經濟上無匱乏，相對的必須服膺留學事務局的管理——每日必須學習中文、研讀儒家經典，農曆特殊節日需聆聽正副監督宣講《聖諭廣訓》，這個清朝皇帝教導百姓做順民的規章，目的是要示以尊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⁴² 石覓譯注：《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頁177。

幼童迅速跨越語言障礙，進入高中，在運動場上也表現優異，長袍長辮影響肢體的伸展，於是開始有人剪辮改西裝，也有人見師長羞於跪叩，或隨寄宿家庭到教堂禮拜。一八七五年美國 *Harpers* 雜誌刊登的漫畫描繪幼童在留學事務局受到教員訓斥。教師手中的紙上寫著「自由」二字，顯然是清政府最不願意在幼童身上看到的素質。

容閔可以切身體會幼童面對異文化的心情，內心也不反對與中國習俗隔斷，不把幼童荒疏中文課業當回事。他的開明作風不但遭受國內保守派攻訐⁴³，與事務局正監督、後來出任駐美公使的陳蘭彬時有齟齬。陳蘭彬認為學生離經叛道，目無師長，沾染惡習，有「以夷變夏」之憂。新上任的事務局監督吳子登嚴格要求學生遵行《諭示》，不可或忘本國規矩，不服從者勒令退學返國。不過由於幼童思想和舉止西化情況未能有效控制，一八八一年陳蘭彬不顧容閔反對，奏請清廷將幼童全數遣送回國，容閔亦隨同歸國⁴⁴。

看似受到「腰斬」的幼童留美計畫，其實為中國的現代化產生深重的影響。當整個世界展開工業革命的激烈競爭時，幼童恰好被送到引領這場變化的競技中心。他們在蒸汽機的轟鳴聲中長大成人，平均六年以上美國教育的薰陶，成為一群無法替代的嶄新族群。

容閔除了在幼童留美計畫中扮演推手和舵手的角色外，在所擔負的外交事務——如新式機器的採買、祕魯非法華工貿易事件的處理、駐美國、西班牙、祕魯三國副公使 (1875) 等職務上，都堅持維護中國主權，以華僑安全為首要考量⁴⁵。他和開洛小姐 (Mary Louisa Kellogg) 成婚⁴⁶，育有二子容觀彤 (Morrison Brown Yung,

⁴³ Thomas LaFargue 著，高宗魯譯註：《中國幼童留美史——現代化的初探》（臺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1982年），頁25。

⁴⁴ 在清廷眼中，幼童們既沒有學到多少西方的科技長處，卻已染上「夷族」的「澆風」，一無是處。參見李喜所、劉集林等：《近代中國的留美教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⁴⁵ 例如十九世紀後期的排華惡浪，令華僑華工處境惡化。容閔兩度會見美國國務卿，同時正式發函，要求美國政府正視排華的嚴重性，採取有力措施保證華僑的權益和安全。他擔任副公使期間，因舊金山稅務局歧視華僑菸草商的政策，與美國政府交涉。促使聯邦稅務局保證恢復原來的擔保制度。

⁴⁶ 開洛小姐是留美幼童團教師，與容閔彼此欣賞。一八七五年他們終於克服女方家庭偏見，組成家庭。容閔的友人回憶道：「他（容閔）總回答我們說，他不想和中國女人結婚，但也不會有美國女人願意嫁給他。我們總是提醒他，他的後半段話是不能證明的。……容閔之婚姻，夫婦均感幸福。」Thomas LaFargue 著，高宗魯譯註：《中國幼童留美史——現代化的初探》，頁40。關於容閔的婚姻，在他的自傳及絕大多數第一手、第二手資料都只

1876-1934)、容觀槐 (Bartlett Gutzlaff Yung, 1879-1942)⁴⁷。

容閔隨同幼童返國翌年，因妻子身體不適赴美照料，一八八六年妻子過世，在美長居十三年。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受張之洞力邀返國。他數度建議實施新政，如聘請外國人擔任外交、財政、海軍、陸軍的顧問，建立國家銀行，修築鐵路等，卻完全不獲採納。容閔說：「予救助中國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⁴⁸此處所說「救助中國之心」是指扶植清朝政府之心，意即，自己透過為清廷效命，改革中國的想法已徹底泯滅。他轉向革新變法，與康有為、梁啟超互動頻繁。戊戌變法失敗後，一八九八年逃離北京。一九〇〇年在上海組織「中國議會」擔任會長，被查緝後再逃往日本，與孫中山同船，之後避居香港，傾心革命派⁴⁹。清廷從未放棄追緝他，一九〇一年他避難至臺灣，見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說：「閣下可從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⁵⁰偌大中國，竟無立命之地，翌年他懷著眷戀和悲憤，登船赴美，從此永訣故土。

辛亥革命成功時，八十三歲的容閔已中風在床，但他仍掩不住興奮喜悅之情，寫信給老友謝纘泰 (1871-1939) 道：

目前在中華帝國發生的政治現象在歷史上確是非凡而空前的。在僅僅數月的劇變中，我們古老的中國，從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幾乎所有省份都舉義參與我們反對滿清王朝及政府的鬥爭。……如果領導者的個人野心產生並

顯示了與開洛小姐的這一段。但戴學稷及徐如兩人合撰的〈愛國華僑學者容閔（上）〉（《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季刊》1982年第1期，頁3-12）一文中，卻出現如下文字：「大約就在六十年代末年，年已四十的容閔在江蘇等候補用並任丁日昌幕僚時，經過朋友的介紹，與比他小二十歲的蘇州一位鄭姓女子結婚。第一次組織家庭生活，他們於七十年代初開始有了一個男孩容若蘭。」如果這段資料屬實，則容閔與開洛小姐相關的婚姻記載及評述，就必須重新思考和處理。容應莢：〈容若蘭是容閔的兒子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291-304）一文中，分別由《容氏譜牒》、容閔一九〇二年的日記，以及容星橋後人的書信和口述三方舉證，對此說提出反駁，指出容若蘭是容閔的姪子，結婚之說也未可證。

⁴⁷ 他們的名字分別是紀念馬禮遜和巴勒特。二人皆畢業於耶魯，學成後均回中國服務，與華人女子聯姻。容觀彤於一九三四年在北京去世。容觀槐後來定居上海，為著名工程師。

⁴⁸ 容閔：〈自序〉，《西學東漸記》，頁154。

⁴⁹ J. Y. Wong 詳細討論了容閔較鮮為人知的革命面向，指出唐才常的起義造成容閔、康有為、孫文三人的交集。起義失敗後，三人在某種意義上放逐了自己，康不再言革命，轉而尋求對君主立憲的支持，容閔則返回美國商界，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影響力。參照 J. Y. Wong, "Three Visionaries in Exile: Yung Wing, K'ang Yu-Wei and Sun Yat-Sen, 1894-1911,"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0.1 (1986): 18-21。

⁵⁰ 容閔：《西學漸記》，頁157。

占據了他們的心，將加重混亂、無政府和流血，不可避免地一定導致外國的干涉。這將導致整個中國被瓜分。願所有中國的愛國者警惕這種危險，防止這種情況出現。如果健康狀況允許，你將發現我很快會回國，縱然不能去同敵人戰鬥，也可以提點對公眾利益有益的建議。⁵¹

他洞見了清政府垮臺對古老中國可能發生的深遠影響，忠告愛國者在政治鬥爭中要警惕野心家⁵²和外國的干涉。更表示想回國為國家和人民效力的願望。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力邀他返國參與建設，他的健康狀態卻不允許成行。民國成立的這一年（1912）四月，容閔在哈特福德自宅辭世，葬於哈特福德市西帶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

（二）新島襄與同志社學校事業

相對於容閔初返中國時面對的保守政治風氣，新島襄在一八七四年，三十一歲學成返日時，眼見的是一個被西化風潮席捲的社會。在橫濱矗立著天主教堂，由橫濱到東京新橋之間鋪設了蒸汽火車使用的鐵道，基督教已解禁，西學塾林立、公費或自費的留歐留美學生，一批批出現。

即便如此，從新島襄留下的許多書信裏，可以窺知他的歸國，不見得出自望鄉懷鄉之念或愛國之情，而是基於傳教的渴望⁵³。在返航途中他致信哈帝夫人，敘道：「在踏入母國國門的此時，我完全感受不到歡欣之情，為何如此自己也想不透。」⁵⁴對於此時的新島而言，美國才是心之故鄉，日本並不。

然而新島返國之際，受到國人矚目比容閔更甚。當年的偷渡者而今堂然往赴外務省提出歸國報告，搭乘維新後才出現街頭的人力車赴安中老家面見雙親，秉告自己以英名 Joseph 擬音更名為「襄」，及奉仕耶和華的決心。他在家鄉小學及寺廟巡迴傳教，鄉親迴響熱烈，雙親也信了他的教，把家中的佛教牌位及護符

⁵¹ 廣東中山市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藏，中譯文引自鄧麗蘭編著：《臨時大總統和他的支持者——孫中山英文藏檔透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頁5。

⁵² 難能可貴的是他以敏銳的政治嗅覺預感到袁世凱是個野心家，勸告革命者絕對不要相信出賣光緒帝的袁世凱。參見謝纘泰著，江煦棠、馬頌明譯：《中華民國革命秘史》，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24。

⁵³ 太田雄三：《新島襄——良心ノ全身ニ充滿シタル丈夫》，頁188。

⁵⁴ 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信函，原文是：“I cannot understand myself why I am so cold when I have a view of going home.” Hardy, p. 179。

等全數燒毀。

反倒是新島本人對於母國種種風習，感到強烈的不解與不能習慣。他堅持在食物、器皿、住家樣式、穿著……維持美國風尚⁵⁵。有人認為他不只是在宗教信仰上改信了基督，在文化信仰上也改信了美國——例如在留學時期他篤信素食能救生靈，回國後則主張肉食對健康之必要⁵⁶。如此對美國文化的偏好，讓他與國內的基督徒間產生嫌隙。植村正久 (1858-1925) 對新島之批判無教會主義，頗有微詞⁵⁷。而在基督界握有影響力的井深棍之助 (1854-1935)、本多庸一 (1848-1912) 等人，也不認同他向美國外籍傳道人協會籌措資金⁵⁸。

即便如此，新島仍不停蹄地為創設基督教學校一事而奔走。與大阪知事交涉未果後，轉而求助於京都府顧問山本覺馬。京都在維新遷都東京後，喪失政治經濟的中樞位置，流失十萬人口，亟思振作。地方政府加碼振興工商業，相對的短絀了教育經費。尤有甚者，政府中止外籍教員的薪資補助，西式學校生存更形不易。因此新島在京都設立英學校，教授近代科學的建議，深受山本覺馬贊同，他捐出近六千坪土地，由新島撰成「私塾開業願」，向京都府提出申請，卻遭受佛教徒的強烈反對未果。新島上京也無法得到在美國結識的木戶孝允、田中不二麿等機要高官支持。周折後，京都府以不得在校內講授《聖經》和神學為條件限制⁵⁹，通過他的申請。

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同志社英學校」創立，最初只有兩位教員——新島襄和 Jerome Dean Davis，學生八人。翌年新校舍竣工，校務步入軌道，並爭取到熊本洋學校的畢業生入學，學生總數達七十人。新島的辦學宗旨——透過「科學、文學知識的學習」，「養成優良的品行及純正的精神」——得到落實。他也在不違逆與京都府協定的原則下，以個人名義購置豆腐店舊屋，講授《聖經》，招收熊本洋學校的優等生入神學預科，聘請美籍傳教士 Alice J. Starkweather 與 H. Frances Parmelee 等人教授基督教信仰與心靈等課程。

⁵⁵ Isabella L. Bird,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Including Visits to the Aborigines of Yezo and the Shrine of Nikkō*, 2nd ed. (London: J. Murray, 1911), p. 238.

⁵⁶ 例如他在〈遊奧記事〉中指出「未食牛肉者，一來是未開化的表徵，二來難以助進取之氣象。」(1888年8月執筆)見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五卷，頁216。

⁵⁷ 植村正久著，佐波豆編：《植村正久と其の時代》第三卷（東京：教文館，1976年），頁647。

⁵⁸ 見內村鑑三：〈新島襄論 新島先生の性格〉，《中央公論》1907年11月號，收入《同志社談叢》vol. 17（京都：同志社大學，1997年），頁236-266。

⁵⁹ 並未限制在校外的相關教學。

此際，他迎娶山本覺馬之妹山本八重 (1845-1932) 爲妻，這是京都有史以來第一場基督教婚禮。新島夫人護鄉愛國，行爲俠義，二十四歲在鶴之城攻防戰 (1868) 中，脫下已捐軀弟弟的戰袍，持槍指揮砲兵，可惜依然挫敗而降服。與新島襄並肩傳福音，在女性地位低落的當時，這樣的舉動和信仰經常招來冷眼看待。然而她依然創辦了「同志社分校女紅場」，後升格爲「同志社女學校」。

一八七六年，京都出現第一所基督教會。一八七九年，同志社送出第一屆十五名畢業生，二年後，女學校也送出第一屆畢業生。繼京都教會後，新島家鄉的安中教會、愛媛的今治教會、神戶教會、岡山教會接二連三的設立，他的傳道範圍也由關西地區、四國地區、中國地區、逐漸向東北、關東地區擴大。他主張各個教會自由自治，把現代化的自由精神與自治思想貫徹到教會的管理上，始終反對教會合併或集權管理。

新島的終極願望，是在日本設立基督教高等學府——「同志社大學」。他寫了封長信給美國外籍傳道人協會，陳述理想的基督教大學是：

- 一，極盡所能，給予基督教牧師最高等的教育；
- 二，針對基督徒醫師施以完整的教育；
- 第三，設置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歷史、文學等講座，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入學，並接受基督教義的薰陶。⁶⁰

他預備設置神學、醫學、法學等三個學院，並爲了培育知識整全的牧師、傳教者，而廣泛地配置各種學系、學科，希望兼顧多元化的學習需要，而招來更多學生，施以基督教的感化。

一八八二年「同志社神學校」順利開辦，他更積極投身於宣傳、募款，陸續發表〈大學設立方案〉、〈同志社社則〉、〈同志社創立始末〉、〈同志社大學校設立旨趣〉等，宣揚辦學理念。一八八四年，政府修正徵兵令後，他爲了爭取私立學校學生緩徵的機會而在東京奔走，未果。接著赴歐洲考察旅行，在瑞士忽感不適，在山頂旅館寫好遺書。稍有起色後轉赴波士頓的監護人哈帝家休養，直至隔年底才返回日本。這也是同志社創立十週年的日子。

即便健康狀況亮起紅燈，他仍爲教育事業奔波不懈。一八八六年他在仙台設立「宮城英學校」，又以京都第二公會爲基礎，設立了「同志社教會」。一八八七年以校長身分出席由「宮城英學校」改名的「東華學校」開學典禮，同年開辦「同志社醫院」及「京都護士學校」。

⁶⁰ 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十卷，頁252-253。

此時新島的身體日漸羸弱，亟需靜養，但他仍在透支體力，一八八八年四月，他與政財界人士集會討論辦學細節時，因腦貧血昏倒。同年，由德富蘇峰起草的〈同志社大學設立之旨意〉在《國民之友》透過全國報章雜誌廣為宣傳，越來越多人認識了他的理念。

該年，東京的政府官員裏協助新島襄最力的大隈重信（1838-1922），因修正不平等條約一事而在外交部長任內，遭反對派玄洋社成員來島恆喜以凶彈炸傷，右腳殘廢。翌年二月，新島的摯友，擔任文相的森有禮（1847-1889）在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當天因參拜伊勢神宮時不慎以靴子踩踏御簾，而被國粹主義者西野文太郎指輕視皇室將之暗殺。這些事件令新島對時局和政治的紊亂十分痛心，他兩度寫信給同志社的學生橫田安止（1865-1935），自述心情道：

近日見國家實況，深感「時危思偉人」之句，時時吟誦之。由政事之亂象，深覺社會欠乏篤實正直之男兒。若渾身良心充沛之大丈夫能起而有為，是所至盼。⁶¹

一八八九年，他抱病前往東北地方籌募建校基金，卻因腸胃絞痛而中斷活動。德富蘇峰等人力勸他移居神奈川縣大磯療養，然而他養病期間，仍寫作大量信件給留在京都的夫人八重子、廣津友信、橫田安止等人，商討如何將基督福音傳播給更多的民衆，於一八九〇年元月二十三日因急性腹膜炎不治，在夫人、摯友、學生的守護下，長眠於若王子墓地。夫人將他的財產全數捐贈給同志社，並繼承他的遺志，開設「同志社尋常中學」（1896）、設置「同志社女學校專門學部」（1901）、設置「同志社專業學校」（1905）、根據專門學校令開設「同志社大學及女學校專門學部」（1912）、根據大學令創辦「同志社大學」（1920）。八重子夫人在一九三二年，以八十六歲高齡辭世。

容閔在學成歸國前夕，寫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1854）的話語，而新島襄在遠航西學之際，吐露「是僕之以赤心所願」（1856）的渴望。無獨有偶，兩個人都選擇「赤子」、「赤心」這樣的字眼，表白對西學的熱愛、對報國的赤膽忠心。綜觀兩人的後半生，也的確在返國後未曾一刻或忘年輕時的願望，以一貫的「赤子之心」，拖曳著各自的東方母國由在前近代跨入近代，企圖透過「教育」的手段來實現「愛國」，迎頭追趕西方的腳步。

⁶¹ 同志社編：《新島襄生誕一五〇年記念寫真集》（京都：晃洋書房，1993年），頁112-113。

四、認同——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

容閔與新島襄的「出走」和「回歸」，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自覺自願，帶著明確的使命感。他們希望將祖國由封建或落後之境提升到能與西方並駕齊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又是帶著反東方即反封建專制閉鎖的目的回國，他們在中國和日本的傳統文化脈絡裏，扮演著逸離規範的叛逆角色。

然而，要是沒抱持對家國足夠的熱愛，他們不會明知「邊緣」、「夾縫」的處境而堅持回鄉。但是異域和跨界的經歷讓他們歸國後像個孤獨的夾縫人般，不輕易見容於本土同胞，反而經常遭遇到不屑、懷疑、敵意和排斥。容閔終不為清廷信賴，最終落得埋骨異鄉的命運；新島傳教和辦學之路都滯塞重重，臨終前並未親睹理想成真。所以當容閔中年喪妻、事業受阻、人所難堪之際，在美國蟄居，一八八七年元旦期間，毛筆寫下新詩一首：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幾多？

以閑為自在，將壽補蹉跎。春色無新故，幽居亦見過。⁶²

無獨有偶，新島在一八九〇年元旦，也許是自知病軀不堪久長，他也提筆以漢詩明志：

送歲休悲病羸身，雞鳴早已報佳辰。劣才縱乏濟民策，尚抱壯圖迎此春。⁶³
兩首莊鳥越吟，都透露著不得志的無奈，卻難捨濟民之心。那麼，家國之愛、宗教熱誠在他們「往」西「返」東、「滯」西「留」東之間，是否經歷量變或質變？他們又如何由邊緣、夾縫位置謀求有效的發言權？

容閔初入美國時，他的國籍和容貌使他成爲一個十足的陌生人。不出幾年，他改裝也改宗、入美籍、娶白人女子，思想上也從根本背離了國教般的儒學，成爲虔誠的基督徒。他主張西方軍力之強不僅在科技表面，尚有廣厚思想基礎爲後盾，那是一種「生活方式」下的產物，認爲此「生活方式」與中國的中庸哲學格格不能相容。他如飢似渴地吸收新知識，希望母國有朝一日能富能強，竭力讓「西方人的觀點」在自己同胞中傳布。

然而換一個角度，容閔對家國的情感，就像他的西方友人的觀察：「從頭到

⁶² 這首詩的原作收於耶魯大學圖書館，轉引自顧長聲：《容閔——向西方學習的先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9-60。

⁶³ 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十卷，頁352。

腳，身上每一根神經纖維都是愛國」⁶⁴。他指出自己的西方經驗有如火苗，引燃對國家的奉獻之愛：

一向被當作西方文明表徵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個東方人變化其內在的氣質，使他在面對感情和舉止截然不同的人時，覺得自己倒像來自另一個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嗎？我的情況正好如此。然而，我的愛國精神和對同胞的熱愛都不曾衰減；正好相反，這些都由於同情心而更加強了。因此……我苦心孤詣地完成派遣留學生的計畫。這是我對中國的永恆熱愛的表現，也是我認為改革和復興中國的最為切實可行的辦法。⁶⁵

中國文化人那種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思維從來沒有離開他，可是政界卻以傳統士大夫來凌駕他，社會也不完全信賴他。他推動清末社會的現代化時，一直處在尷尬的位置上，朝廷借用他的「長才」，運用在西學、外交、洋務上，卻又將他和傳統教育出身的士人加以區分，讓陳蘭彬等「純正大儒」掌理主權⁶⁶。

反觀新島襄在踏上美國土地前，便已改裝斷鬚，然而英文是他的第二、第三外語⁶⁷，因此在波士頓海關面對「為何赴美？」之類的問題，未能充分答覆⁶⁸，可以想見初期的語言隔閡。不過當他學成時，已經能夠流利使用英語交談、書寫各式文案、演說。他以洋名改動得自雙親的名字，且令人驚訝的是，檢視他所留下的所有書信，除了偶爾的病痛外，從未出現任何對美國風土文化負面的觀察和感受，也從未表露過對日本的鄉愁。如同新島研究者的評語：

美利堅合眾國對新島而言，美善莫此為甚。他未曾吐露過任何批評的話語。⁶⁹

⁶⁴ Rev. Joseph H. Twichell 於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在耶魯大學法律學校肯特俱樂部 (Kent Club) 發表的演說。〈附錄·吐依曲爾氏之演講〉，同前註，頁173。

⁶⁵ 容闈：〈自序〉，同前註，頁39-40。另參照林家有：〈論容闈的報國心〉，收入吳文萊主編：《容闈與中國近代化》，頁15-31。

⁶⁶ 類似境遇也發生在留美幼童身上，可見此觀念之根深蒂固。幼童多半未升到最高職位，被壓在「九品」之下，而科舉出仕者比較容易出掌公職。民國成立後，由於幼童已在清政府工作有年，無法擺脫「滿清遺老」的烙印，而此後中國的留洋學生毋須背負與舊政權的不利瓜葛，很快地取代了幼童的領導地位。

⁶⁷ 容闈自小接受西塾教育，奠立英文基礎；新島襄則始學荷蘭文、德文，稍長才學習粗淺英語。

⁶⁸ 同志社編：《新島襄——その時代と生涯》，頁37。

⁶⁹ 和田洋一：《新島襄》（東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3年），頁120。太田雄三也指出，異地留學生涯，一般人是苦樂參半，正負感情共存。比較起稍後留美的森有禮、內村鑑三等人在信件和記事中所流露的鄉愁與正負參半的感受，新島襄的完全肯定讚美，相當

他盛讚美國的一切，即便終生維持日本籍，作為一個虔誠的教徒和牧師，恐怕他在精神上認同西方更甚。雖然沒有正式的名分，然而他與監護人哈帝夫婦之間有「養子」之口頭協定，哈帝夫婦視他如己出，他也在姓名裏加上哈帝之姓氏⁷⁰。他回國後對母國風習的不適應，以及堅持在食衣住行各方面維持美國風尚，都透露著他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信仰上的西化。

日本非以科舉取士，新島襄也沒有選擇從政，不但以傳道者、教育家的角色終其一生，也刻意不對國家政策多作發言。他的留洋背景碰上維新西化的浪潮高漲，似乎應該適逢其時。然而他回國時依然因洋化的舉止而不受本土基督徒歡迎，在日本設立基督教學府一事，也並非一帆風順，而遭受來自佛教、神道等本土宗教的反對和質疑，也不容易在短時間內得到政策的背書、高官的支持。

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發達的經濟文化，刺激他們意識到原生封建社會的黑暗和不公，並激起批判和改造的情懷。換言之，美式文化對個人自由的尊重，給予身處其間的他們莫大震撼，啓迪他們將思索範圍從自我延伸到祖國。而基督信仰在兩人的思想中，舉足輕重，他們十分認同且嚮往基督教式的大同主義——不分民族、不分性別、不分窮人富人的平等互愛。基督教尤其在他們面臨事業困境和理想受挫之際，發揮了莫大力量。

容闈曾經顧慮自己回歸本土後的前途，但一條經文啓示了他：

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更是如此。⁷¹

在容闈心目中，「自己」、「自家人」這些字眼意味著孕育他的祖國。他活像是從整個民族人選拔出來領受這份恩澤似的，湧現著正義感和報恩心，決心回鄉⁷²。

而新島襄眷戀美國比故土更甚，他大學期間罹患感冒休養，寫信給西頓夫人說道：「身體病時，我也害了嚴重的相思，思念的不是日本安中的吾家，而是在安道佛的吾家」⁷³。面臨是否歸國的抉擇時，他致信給希利教授夫婦，敘述揮別

少見。參見前引太田雄三：《新島襄——良心ノ全身ニ充滿シタル丈夫》，頁122-124。

⁷⁰ 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新島襄所作「致安道爾友人們」的信裏，有如下的記述：「從今而後，我的名字裏將加上 Hardy 這個姓氏。」（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六卷，頁144）

⁷¹ 《聖經》（香港：聖經公會，1964年）〈提摩太前書〉，第5章第8節，頁300。

⁷² 石霓：《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頁58-59。

⁷³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信函。見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六

美國遠較自己當年潛逃出國門，要來得不捨⁷⁴。踏上歸途前夕，他剖白心事道：

我有滿腔肺腑之情，卻橫溢胸中而難以言表。要與在這裏的眾多友人離別，內心苦痛無以言喻。好比由如日中天之地，前往夜色待旦之地般，感覺難過不捨。然而，我只能以天主由天之耶魯撒冷降到地之耶魯撒冷並將我救贖一事，為法為效，天主如此，我必跟隨。從此我不再哭泣。⁷⁵

容閔與新島襄均受洗，信仰均虔誠，卻在「是否獻身神職」這一點上，因為各自不同的「報國」觀，而做出迥異的決定。

容閔先是拒絕倫敦傳教會的資助留在美國求學，當孟松學校董事會以畢業後必須回中國擔任傳教士為條件，向容閔表示如果他能「熱心傳道，使中國信仰上帝，人人為耶穌教徒」，便補助他的大學學費。結果遭到容閔以如下理由拒絕：

予雖貧，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學，無論何業，將擇其最有益於中國者為之。縱政府不錄用，不必遂大有為。要亦不難造一新時勢，以竟吾素志。若限於一業，則範圍甚狹，有用之身，必致無用。⁷⁶

容閔認為，傳教固然是一項值得投入的事業，卻不適合於中國，因為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義實際上與中國文化並未曾完全地融合過，中國人不信仰基督教，對中國人傳教只能是「有用之身，必致無用」。他的這個決定讓自己和慈善基金來源一刀兩斷，把自己的經濟逼上絕境。然而基於對祖國文化的了解，他認為真正能拯救中國的不是宗教，而是科學。暫時的貧窮，改變不了他以科學救國的信念。他說：

傳道固佳，未必即為造福中國獨一無二之事業。以吾國幅員若是其遼闊，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國國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諾將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滅，誰能禁之。況志願書一經簽字，即動受拘束。將來雖有良好機會，可為中國謀福利者，亦必形格勢禁，坐視失之乎？余既有此意，以為始基宜慎。則對於校董諸人之盛意，寧抱歉衷，不得不婉辭謝之。嗣海門悉予意，深表同情。蓋人類有應

卷，頁24。

⁷⁴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信函。同前註，頁76。

⁷⁵ 新島在 Rutland 演說後受訪之言，此段文字由記者記載，刊登於 *Rutland Weekly Herald*，日譯刊登於同志社社史史料編集所編：《同志社百年史——資料編二》（東京：同志社，1979年），頁64。

⁷⁶ 容閔：《西學東漸記》，頁58。

盡之天職，決不能以食貧故，遽變宗旨也。⁷⁷

爲了保有自己返國後選擇職業的自由，爲了能選擇一種真正能報國濟民的行業，他不願意過早受到條件限制。

新島襄早早便立定傳道的志向，在美國求學期間的選科及學習，都在爲成爲傳道人而準備。當岩倉使節團赴華盛頓考察時，他的留學身分受到認定，森有禮也主動向他建議，若由監護人哈帝夫婦具狀提報給明治政府，則新島在美國過去及未來數年的教育費，將由政府全數支給。新島聽聞後，寫信給哈帝鄰居富林特夫人 (W. F. Flint) 說，如果哈帝夫婦提出申請，自己將受到明治政府的任命所拘束，無法當一個「自由的日本公民」(a free Japanese citizen)⁷⁸，也無法專務職事 (Master's business)。最後哈帝並未提出教育費清單，申請補助。當使節團邀請他一同赴歐擔任翻譯時，他也表明願意傾自己的長才協助外交工作，卻不願意有金錢、契約的約束。他表示：

我願蒙耶穌之大愛，順從自己良心之光輝，作爲一個純正的基督徒，返回我的祖國。⁷⁹

他同樣爲了保有職業的自主選擇權，爲了要當個自由自在的傳道人，婉拒政府的經濟援助，繼續接受哈帝一家的資助⁸⁰。

與容閔的判斷不同，他認爲日本人需要基督教。進入神學院那年，他寫信給家鄉前輩飯田逸之助，說道：

小生赴美，時刻思索歐美各國究竟如何既富且強，漸窺其奧妙。……美國人所信奉者，乃唯一真神之真理，我等參拜者，乃不可見之魂靈。若吾等亦能相信天地萬物爲天帝所造，參拜此真神，信祂愛祂、必能起憂國愛民之志，一心以富國強兵爲念。……信此道之國，無貴賤之別，富者濟貧，貴不自貴，賤不自賤，上下一致，無可廢毀。……小生歸國後，欲傳此福音，救國人於塗炭。⁸¹

他主張宗教信仰將導致團結愛國，無堅不摧。

容閔與新島襄接受的美式教育、融入美式生活、接受美式的價值觀，成爲在

⁷⁷ 同前註，頁58-59。

⁷⁸ "To Mrs Flint," Andover, March 21, 1871, Hardy, p. 102.

⁷⁹ "To Mrs Hardy," Amherst, June 18, 1871, *ibid.*, p. 103.

⁸⁰ *Ibid.*

⁸¹ 一八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給飯田逸之助的信函，收錄於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三卷，頁88。

思想上相當西化，卻又可以由宏觀來審思祖國社會需要的人。他們對東方對西方都有所認同也都有所隔膜、在東方在西方都處於「邊緣」和「夾縫」境遇，是「跨文化」帶來的優勢和劣勢。他們的行事風格有異於祖國傳統知識分子，例如容闈在自強運動中比當時的主事者來得激進⁸²，兩人也都訴求超越器物層次的，思維模式的現代化。如此讓他們與傳統知識分子共商改革時，遭遇了一些阻力。他們都支持積極西化，然而對基督教的認知和對祖國民情的認知，導致他們在職業選擇和國家人民之所需等事上，做了相異的判斷。在文化和國家認同上，也表現出強弱與取舍趨向的主觀。

五、結語：由師夷之長到西學之子

容闈之作爲「中國留學生之父」，而新島襄之作爲「日本開化史之先覺者」，可以微觀也可以巨視地代表中、日兩國由「師夷長技」到走出國門的歷程。

從海禁／鎖國到積極西學，中國和日本都經歷了一段長遠的道路。明太祖爲防倭寇而實施海禁，在明、清兩代時張時弛，直到清道光年間（1842）爲止，長達四百八十年的期間，中外貿易一直被嚴格限制在少數港口進行。德川幕府一六三九年頒佈的「鎖國令」，只開放長崎對明國和荷蘭貿易，從此自己孤立於世界二百五十年。

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的敗戰，驚醒了日本人，佐久間象山（1811-1864）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⁸³以補日本之不足，主張「以夷之術防夷」。橋本左內（1834-1859）也提出：「仁義之道，忠孝之教由吾開。器技之工，藝術之精取於彼。」⁸⁴他們依然推崇儒教道德至上，視西洋技藝爲奇技淫巧，無奈地認識到必須「師夷之長以制夷」。

而黑船叩關迫使幕府遷就現實，開始一連串的「安政改革」（1855-1860）——

⁸² Bill Lann Lee, "Yung W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 *Amerasia* 1.1 (Mar. 1971): 27-28.

⁸³ 佐久間象山：《省警錄》，收入《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十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頁413。

⁸⁴ 轉引自山口宗之：〈橋本左內・橫井小楠——反尊攘・倒幕思想の意義と限界〉，收入同前註，頁701。

向荷蘭商館訂購軍艦、槍砲及軍事書籍，派人學習荷蘭砲術；又成立洋學所、長崎海軍傳習所。各藩也競相學習西洋科技：長州藩採用洋式槍砲、製作洋船、刊行世界地圖，薩摩藩採西洋技術煉鐵、製作電信機、槍砲、農具、蒸汽船，肥前藩製造火砲……。新島襄之留美，就在此時。而在他之前，公費留法、留荷、留英者已經出現，與他同年，薩摩藩也開始派出留美學生。雖然新島是日本赴美留學生中取得大學學位之第一人，然而與他同期有為數甚多的留美、留歐學生，承先啓後。

清廷改革的腳步沈重和緩慢許多。容閔留美、黃寬留英之舉，早了新島襄十九年，卻由於清廷西化政策的舉棋不定，保守派和洋務派之間的拉鋸，容閔建議的官派幼童一直未獲採納，在他留學返國足足十八年後才出現留洋踵繼者。與第一批幼童出洋的同一年，何啓 (1859-1914) 自費留英習醫，第四批幼童赴美的那年 (1875)，開始有中國學生赴英、法、德學習造船、機械等。而一八七八年，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啓程前往歐洲，之後由於政策的搖擺，留學生出洋時斷時續，直到一九〇〇年初期，出現大量留日學生。

由日本遣唐使到清末中國學生留日潮，學習的客體和主體，終於逆轉。中國派遣公費生留歐，不僅落後日本整整十六年，就留學國家及學生所學科目而言，也略有不同。中國學生初期除容閔外，所學以醫學、法律、科技、軍事為主，留洋國限於美、英、法、德，後來加上日本。而日本留洋學生所學雖也以實用科技及軍事為主流，卻也有不少學生修習數、理、化等科學及文學、哲學等等，而留學國除美、英、法、德外，也涵蓋俄國、荷蘭、葡萄牙、普魯士，及少數的中國留學生。若以李鴻章和森有禮之間的對話⁸⁵，來比較中日西化觀的不同，可以發現日本掌權者趨向柔軟的，兼容並取的態度，取之則積極吸納調整為合乎己用，中國掌權者似乎還是相當受到傳統所錮。

檢視容閔與新島襄的教育愛國思想，似乎前者比後者對國情抱有更多「同情的憐憫」，因為入世，所以見聞更貼近社會現實。即便微不足道的漢文基礎，遠不能使容閔有望於「科舉取士」，他個人的興趣、觀念和人格都與傳統士人不同。然而他返國後，著眼於「教育」以「救國」，與政界互動頻繁，思想和行動

⁸⁵ 這裏我希望引述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收入《中國人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東京：日本圖書，2005年〕，頁63-64）中收錄的，李鴻章與森有禮於一八七五年在保定的一段對話，很有趣地表達出當時中日掌權者對西化問題看法的差異。該段文獻的中譯可見於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頁73-75。

一直跟隨著時代潮流向前進，不保守也不封閉⁸⁶。他先是同情中國的農民起義，對太平天國提出的七項建議中⁸⁷，有四項直接涉及教育，其餘三項也間接與近代化教育有關。而當意識到太平天國之腐敗蒙昧後，他轉向洋務派，參加「自強求富」活動，一八六七年向曾國藩建議「於江南製造局內附設兵工學校」，以培養科技人才，獲得支持⁸⁸。翌年又透過丁日昌向朝廷建議派遣幼童赴美留學，指出這是「中國復興希望之所繫」。他目睹中國的貧弱和人才的缺乏，深感唯有迫切地推進教育近代化，培養新式人才，才能真正救國。可惜因為幼童留美計畫無法貫徹，容閔式的改革最終並沒有他所設想的，培養出新一代的政治領導者，甚至在一連串的战亂和革命後，結果並沒有形成西化的中國，而是共產中國。

新島襄在留美前的航路上，目睹清朝陳腐的實況⁸⁹，又眼見上海、香港、西貢、馬尼拉被帝國主義殖民的情景，強烈的危機意識湧現，他不希望日本步上後塵。留美期間他汲汲於探尋美國先進的秘密，看到出生在肯塔基州山間小屋的貧困孩子竟能當上美國總統⁹⁰，主張國家的力量來自於個體，而個體的力量來自於個體的生存樣態。作為一個偷渡者，他反而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不受藩國與幕府拘制，而能夠在洋溢清教色彩的新英格蘭，成為嚴謹的基督徒，以和清教徒幾乎同調的觀點和立場，審視美、日文化。

然而新島對美國的見聞似乎有限，在哈帝家，他過的是「富商之子」般的生活。他對美國生涯的記事裏找不到任何悲苦或負面的話語，不曾把眼光擴及印地安人及黑人，也似乎從未感受到黃種人身分而遭受白種人的不公平對待。根據許多記載顯示，新英格蘭雖人文薈萃，卻是一塊保守且歧視黃種人的土地。在新島之前，年輕的漁夫中濱萬次郎⁹¹在一八四〇年代因海難受美國船隻所救，曾述及

⁸⁶ 戴學稷、徐如：〈論容閔的愛國主義其貢獻及其歷史地位〉，收入吳文萊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頁1-14。

⁸⁷ 七項建議即：一、依正當軍事制度，組織一良好軍隊；二、設立武備學校，以培養多數有學識的軍官；三、建設海軍學校；四、建議善良政府；五、聘用富有經驗之人才，為各部門行政顧問；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為主課；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參見黃順力：〈容閔與近代「教育救國」的思想和實踐〉，收入同前註，頁109-119。

⁸⁸ 此可謂容閔「向所懷教育計畫，可謂小試其鋒」（容閔：《西學東漸記》，頁121）。

⁸⁹ 新島寫日記嘆息道：「支那人尊己國，稱中華。然今其諸港為取奪，空受英人之管轄，嗚呼中華之意在於何處乎？」（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五卷，頁75）。

⁹⁰ 即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

⁹¹ 土佐人，從事漁業。一八四一年因船難而被美國船隻救起，在美國捕鯨船工作，並得以遊

抵美後在離波士頓不遠的懷海文 (Fairhaven) 經驗種族歧視的窘況。當時中濱的恩人浩特菲德 (Hoitfield) 船長請託所屬教會接受萬次郎一起禮拜，並允許他參加主日學，卻遭到教會峻拒，主張黃種人不得與白人平起平坐，也不能在同一學校受教育⁹²。與新島同時期在美國求學的留學生井上記述道：

關於宗教，彼等（美國人）總要求我們向教會獻納，且於每週日前往教會禮拜。我們實在提不起興趣，彼等展現絕大耐心，兩度、三度、四度必說服而後已。然而在我們看來，彼等的教會無異於會計室，彼等的聖經無異於帳簿，彼等口中所謂「萬能之神」，其實是「萬能的美金」而已。⁹³

顯見作者對基督教的反感。而一八八〇年代赴美的內村鑑三，多次在記述裏描寫自己的黃外表被白人歧視的不堪。他說：

被人視為支那人看待，出入皆飽受嘲笑，其苦非紙筆所能形容。誰謂海外生活愉快？盼早日歸國與黃種人共起居也。⁹⁴

相反的，新島襄不僅未曾感受到任何種族的屈辱，反過來認為本國風習野蠻落伍。他曾對美國友人表示：「較之於故國風習之野蠻，我更欣賞貴國的風習。」

「較之由樹木石頭間顯現的神明，我更欣賞真實的神。」⁹⁵他不止一次地對日本信仰的神、佛表示厭惡。曾說：

對於那些被人為造作出來的可厭的神明而言，這個階層（農民）是忠貞的信者。他們被狡猾的僧侶們看中，付出高額的捐款來支付僧侶的生活費。僧侶們說，只要將高額的捐款獻給神明者，絕不會受地獄之火波及。然而，這些捐款其實入了僧侶的口袋，他們自命清高，禁絕妻室。以裙帶關係為不潔，卻私底下做出這種偷天換日的犯罪行為，以信眾之現金滿足私利。我為這個階層（農民）感到可悲。⁹⁶

他對於日本農民向神佛教界捐款的想法，與上述 E. R. 井上對信徒向教會獻納的

歷美國。他在美國受初級教育，從事捕魚和採礦，一八五二年回鄉，翌年為幕府所用，負責翻譯英文之職。

⁹² 中濱東一郎：《中濱萬次郎傳》（東京：富山房，1926年），頁81。

⁹³ E. R. Enouye 的這篇文章 “The Practical Americans” 收錄在 Charles Lanman 所編 *The Japanese in America* 中，該書輯錄十四篇與新島同期日本留學生的撰文。

⁹⁴ 內村鑑三：《內村鑑三全集》第三十六卷（東京：岩波書店，1932-1933年），頁188。關於當時的歧視，太田雄三：《新島襄——良心ノ全身ニ充滿シタル丈夫》，頁125也有分析。

⁹⁵ Hardy, p. 63.

⁹⁶ 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六卷，頁68。

看法，十分有趣的不謀而合。

新島多次使用「未開化」(the benighted) 一詞來形容日本、日本人，如未開化的日本 (the benighted Japan)、未開化的國民 (the benighted nation)、我那未開化的同胞 (my benighted countrymen) ⁹⁷等等。有歷史學家以「成功的吉田松陰」來形容新島襄偷渡成功赴美之舉，幕藩體制在新島留美期間崩解，還因此得以赦免潛逃之罪。然而，比較起森有禮以「國家」為首要考量，新島以「國民」為首要考量⁹⁸，他注重個體的主體性與自由，希望在日本教育出「自由，活潑，有德」⁹⁹的人民，締造出美式「民有、民治、民享」的社會。對他而言「民治」尤其重要，因此他主張創辦基督教大學，以等比級數塑造出越來越多的「自治自立」¹⁰⁰的公民。然而他對日本風土、傳統和體制的疏離與排斥，致使他未能充分考量現實需求，而一味的導入西方宗教及政治思想，這樣的焦急很可能來自避免日本重蹈清帝國覆轍的心態。

容閔和新島襄都對於自己所生的時代，抱持強烈的危機意識，洋行之舉近乎個人規模的「脫亞入歐」，但跨文化的際遇和邊緣及夾縫的處境，畢竟讓他們多少有些思慮不週或有志難伸之處。他們的研究者碰巧都喜歡使用《聖經·舊約》的摩西和大衛王來形容他們未酬的壯志。摩西一生的理想是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迦南，卻未到達目的地就去世，由約書亞領導以色列人入迦南。大衛王一生的希望是為神建造聖殿，卻至死未能實現理想，由其子所羅門王完成。然而後人尊崇摩西甚於約書亞，喜愛大衛王多過所羅門王。他們都懷抱著遺憾辭世，但他們對中、日現代化的貢獻不可抹煞，所開展的國際觀也以各種形式繼續被後人保留。《聖經》有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¹⁰¹

容閔與新島襄的確彷彿落地的麥子一般，在東方土地上滋長出蓬勃的西學生命力來。

⁹⁷ Hardy, p. 65, 143, 156.

⁹⁸ 井上勝也：《國家と教育——森有禮と新島襄の比較研究》，頁131。

⁹⁹ “To Mr. and Mrs. Hardy,” Georgetown, D.C., March 8, 1872, Hardy, p. 103.

¹⁰⁰ 新島襄：〈同志社大學設立の旨意〉，見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第一卷，頁137。

¹⁰¹ 《聖經》，〈約翰福音〉，第12章第24節，頁146。

【附錄】容闈、新島襄、中日留學生年表

年份	容闈年表	中國留洋學生	新島襄	日本留洋學生
一八二八	十一月七日出生廣東香山縣。			
一八三五	赴澳門入郭實臘夫人的學堂就讀。			
一八三九	學堂停辦，失學返鄉。			
一八四〇	父逝，以賣糖、拾穗、印刷廠零工，幫助家計。			
一八四一	入香港馬禮遜學堂。			
一八四三			二月十二日出生江戶神田安中藩邸。	
一八四七	隨鮑留雲赴美，入孟松學校。			
一八四九	受洗為基督徒。	黃寬入英國愛丁堡大學習醫。		
一八五〇	孟松畢業，入耶魯。			
一八五二	入美籍。			
一八五三			入安中藩學問所學習漢籍及劍術、馬術。	
一八五四	耶魯畢業。 十一月十三日離美返國。			
一八五五	任美國駐華代理公使伯駕祕書（廣州）。 轉任高等審判廳通譯（香港）。	黃寬取得愛丁堡大學醫學學位。		安政改革。
一八五六	任上海海關翻譯，四個月後辭職。 於上海、九江兩地經商約七年。		學習蘭學及少許英語。	
一八五七			元服。擔任祐筆補助役。	
一八五八				六月，簽訂美國通商條約。

一八五九		王韜赴英，訪問牛津、愛丁堡、蘇格蘭等大學。	於藩學教授書道。	鮑留雲赴日辦學及傳教。後來帶領日本首批留美學生到美國。
一八六〇	向洪仁玕提出建設法案，未獲採納。離開南京返上海。		獲選為藩主護衛。前往幕府軍艦教授所學習數學及航海術。	遣美使節團岩瀨忠震、井上清直等人出發。 法：小出千之助。
一八六一				遣歐使節團竹內保德等三十八人出發，福澤諭吉任翻譯。
一八六二			入甲賀源吾的洋學塾。	首批官派留荷學生：內田恒次郎、榎本釜次郎、澤太郎左衛門、田口俊平、高橋三郎、西周、津田真道出發，習海軍、造船、醫學、法律、測量、砲術等。
一八六三	曾國藩授五品軍功銜，成為清政府官員。		開始學習英語，閱讀日譯《魯賓遜漂流記》、中譯美國相關書籍、《聖經選錄》等。	英：伊藤博文（海軍）、井上勝（數理、鐵道）、三尾庸三（工學、造船）、井上聞多（海軍）、遠藤謹助（經濟、造幣）。
一八六四	春，赴美為江南製造局採購機器。		由品川往箱館，轉上海，再轉往香港，橫越大西洋。	法：原田吾一（海軍）。
一八六五	春夏返國，攜回機器一百數十種。清政府授與五品候補同知官銜，出任江蘇布政司衙門翻譯。		抵波士頓。入菲利普高中。	美：薩摩藩富山良之助、鮫島尚信等十五人。 俄：市川文吉（礦學）。 荷：松本銚太郎（化學）。 英：五代友厚、鮫島尚信（文學）、高見矢一、田中盛明（醫）、外山正一、新納刑部、畠山義成（陸軍）、堀壯次郎、松村淳藏（海軍測量術）、村橋直衛（陸軍）等。

一八六六			<p>於安道爾附屬教會受洗。</p>	<p>幕府頒布英、法、荷、葡、美五國留學許可。 美：一條十次郎、種子島敬輔、吉原重俊、磯永彥助等。 德：赤星研造（醫）。 英：平岡森三郎、林董三郎（醫）、箕作大六（理化）等。 法：德川昭武（陸軍）等。 香港：鏑木立本（英學）、渡邊莊平（測量）。</p>
一八六七			<p>菲利普高中畢業。入安默斯特學院。</p>	<p>青木善平、後藤常、勝小鹿、日下部太郎、高木三郎、高橋是清、柘植善吾、富田鐵之助、船越慶次、井上良一、伊東祐享等人赴美。 英：南鄉茂光、河北義次郎、河瀨眞孝、藤本盤藏。 荷：飯田俊德。 法：伊東貫造、海老名郡次、尾崎俊藏、菊池平八郎、木村宗三（砲兵學）、栗本貞次郎、澀澤榮一、神保寅三郎（海軍）、高松凌雲（醫）、服部潤次郎（普通學）、山內勝明（陸軍）。</p>
一八六八	<p>建議於江南製造局附設機械學校獲採納。 上奏設請立輪船局、選派幼童出洋留學等四條建議，未獲採納。</p>		<p>春假、暑假都到各地參觀礦山並四處旅行。</p>	<p>美：津川顯藏等二人。 法：太田德三郎等二人。 荷：馬島健吾。 英：岩本勝之助等六人。</p>

一八六九				<p>美：島津忠亮、深津保太郎等。 德：荻原守教等三人。 荷：伍堂草爾。 中：小牧善次郎。 英：佐藤鎮雄等五人。 法：渡六之介。</p>
一八七〇	<p>請丁日昌向曾國藩進言，重提留學計畫獲准。</p>	<p>「天津教案」發生，「外交」與「自強」變得重要與急迫。</p>	<p>安默斯特學院畢業，獲理學士學位。入安道佛神學校就讀。</p>	<p>美：石澤源四郎、岩倉具定、岩倉具大、經上杉勝賢、大塚綏、澤良雄、大塚綏、兒玉淳、杉浦弘藏、鈴木貫一、田尻稻次郎、外山正一、能勢榮、福澤一太郎、藤森圭一郎、堀誠太郎、矢田部良吉等。 英：天野清三郎等四十三人。 德：池田謙齋等二十六人。 法：飯塚修平等二十二人。 魯：嵯峨壽安等二人。</p>
一八七一		<p>九月九日，幼童留美計畫獲聖旨批准。</p>	<p>森有禮斡旋下，獲日本政府發給留學許可書。</p>	<p>美：淺田逸次、有馬幹太郎、大久保金三郎、小野粹、下子堅太郎、日下義雄、橋新吉、田中貞吉、林純佐、原六山、山岡次郎、（最早川健次郎、（最早日本女留學生）永井繁子、津田梅子、上田梯子、吉益亮子等。 英：赤根倍作等六十三人。 德：青木周藏等二十九人。 中：兒玉利國等六人。 法：稻垣喜多造等十四人。 俄：江村次郎等四人。 中：伊地知清三郎 香港：井川納郎等二人。</p>

<p>一八七二</p>	<p>任中國駐美肄業局副監督，率先赴美。</p>	<p>八月十一日，第一批留美幼童赴美。蔡紹基、鍾文耀、歐陽廣、容尚謙、蔡錦章、張康仁、劉家照、譚耀勳、陳大器、陸永泉、鄧士聰、鍾進成、史錦鏞、黃仲良、龐榮光、梁敦彥、何廷佑、潘銘鍾、詹天佑、陳巨鏞、陳榮貴、吳仰增、羅國瑞、曾篤恭、黃開甲、牛尙周、曹吉福、石錦堂、黃錫寶、錢文魁。何啓 (1859-1914) 自費赴英國亞伯丁大學學習醫，隨後又於林肯法律學院習法律。</p>	<p>與田中不二 前往歐洲，視察各國教育制度。</p>	<p>美：赤羽四郎、岩崎彌一、西鄉菊次郎、酒井忠邦、高木貞作、山本彌三、吉村又藏等。 英：飯塚義光等十七人。 法：上村四郎等十三人。 德：裏松良光等八人。 奧：服部杏圃。 俄：宮地堅一郎。</p>
<p>一八七三</p>	<p>返國，為中國引進新式武器。</p>	<p>五月十八日，第二批幼童赴美：容尚勤、王鳳階、蘇銳劍、陳乾生、丁崇吉、唐國安、龐詠鍾、方柏樑、陸錫貴、曾溥、吳應科、梁金榮、吳仲賢、李桂攀、宋文翹、龐景垣、黃有章、鄧桂廷、梁普照、唐元漚、李恩富、卓仁志、張祥和、梁普時、王良登、蔡廷幹、溫秉忠、張有恭、陳佩瑚、容揆。</p>	<p>返國，提《理事功程》。九月十四日，安道佛神學校復學。</p>	<p>美：箕作佳吉、鮫島武之助。 英：井上十吉等十人。 德：原田豐吉等六人。 奧：藤山種廣等四人。</p>
<p>一八七四</p>	<p>春，返美。（第四次赴美）夏，派往秘魯調查非法華工貿易。</p>	<p>八月九日，第三批幼童赴美：周長齡、楊兆南、唐致堯、黃季良、康廣齡、楊昌齡、林沛泉、袁長坤、徐芝煊、孫廣明、朱寶奎、龐景揚、鄭廷襄、龐賢彝、祁祖彝、唐紹儀、曹嘉爵、梁如浩、薛有福、沈嘉樹、徐振鵬、吳敬榮、宦維城、朱錫綬、程大業、周萬鵬、盧祖華、曹嘉祥、容耀垣、曹茂祥、伍廷芳 (1842-92) 自費赴英國林肯法律學院學習法律。</p>	<p>得安道佛神學院碩士學位。在波士頓 Mt. Vernon Church 接受按手禮，正式成為神職人員。在 Rutland 召開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第六十五屆年會，以日本需設立基督教學校為題演說，得約五〇〇〇美金捐款。返國，抵橫濱。面見安中雙親。</p>	<p>美：森村豐、松平定教、中川耕山、高橋新一等。 英：小泉信吉等三人。 德：久松定弘。</p>

<p>一八七五</p>	<p>任清政府駐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副公使。娶瑪麗小姐 (Mary Louisa Kellogg)。</p>	<p>九月十六日，第四批幼童赴美：林聯輝、唐榮俊、陳福增、吳煥榮、黃祖蓮、周傳諤、陸德彰、金大廷、沈德輝、沈德耀、林聯盛、唐榮浩、劉玉麟、陳紹昌、黃耀昌、鄭國光、鄭炳光、梁丕旭、吳其藻、馮炳鍾、陳金揆、李汝淦、沈壽昌、周傳諫、王仁彬、陶廷賡、盛文揚、梁金鰲、潘斯織、譚耀芸、劉步蟾、林泰曾赴英國高士堡學堂。魏瀚、陳兆翱、陳季同赴法國馬賽習造船。</p>	<p>得京都府顧問山本覺馬的舊薩摩屋敷近六千坪，做為建校之地。兩人聯合向京都府提出「私塾開業願」。受京都府約束，在校內不得教授《聖經》。創立同志社英學校。</p>	
<p>一八七六</p>	<p>耶魯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p>	<p>幼童於費城「世界博覽會」拜會美國總統格蘭特。中國設立美國公使館。公使陳蘭彬、副公使容閔。陸軍派遣卞長勝、王德勝等七人赴德國留學。</p>	<p>娶山本覺馬之妹山本八重。熊本洋學校學生入同志社。在 Davis 家設女子塾。自宅設京都第二公會。</p>	
<p>一八七七</p>	<p>留學事務局在容閔的主持下完竣。</p>	<p>第一批幼童史錦鏞被召回國，半途剪辮改西服，是幼童最早的反叛行為。</p>	<p>由京都府得女學校開校許可。</p>	
<p>一八七八</p>	<p>陳蘭彬赴美就任公使館公使。容閔常駐華盛頓。留學事務局內務日趨複雜。</p>	<p>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等聯合上奏《選派船政生肄業章程》通過。二十八名學生與監督由福州經香港前往歐洲，乃第一批官派留歐學生。</p>		
<p>一八七九</p>		<p>陳蘭彬推薦吳子登為第四任留學事務局監督。</p>	<p>訪勝海舟。第一屆畢業典禮，畢業生十五名。</p>	

一八八〇		吳子登向留學生發布《諭示》不服從者，退學并遣送回國。 美西發生「排華」潮。		鮑留雲病逝孟松。頒佈〈改正教育令〉。
一八八一	副公使職期滿返國。	總理衙門決定幼童全數撤回。幼童離美。 寧波金雅妹(1864-1934)入紐約醫院附設女子醫科大學(最早中國女留學生)。 第二屆留歐學生黃廷等十名，分赴英、法、德三國學習，學制三年。		
一八八二	妻病，赴美，此一居住十三年。		女學校第一屆畢業典禮，畢業生五名。	頒佈〈軍人敕語〉。
一八八四		福州柯金英(1866-1929)入費城女子醫科大學。	赴歐美旅行，在瑞士健康惡化，以英文寫遺書。 赴波士頓與 A. Hardy 夫妻再會。	自由民權運動。 井上哲次郎留德。
一八八五			返抵橫濱。 舉行同志社創立十周年紀念會。	外山正一主張廢漢字，以羅馬字替代，振興英語。
一八八六	妻逝。	第三屆留歐學生共三十三名赴英、法，學制改為六年。	在仙台開設宮城英學校。	
一八八九			安道佛神學校授予名譽學位(L. D.)抱病前往東北地方募款時腸胃絞痛病發，移居神奈川縣養病。	頒佈《大日本帝國憲法》。
一八九〇			喚夫人及摯友至病榻前口述遺言，由德富蘇峰筆記。 一月二十三日，以急性腹膜炎辭世，長眠若王子墓地。	

一八九二		江西康愛德、湖北石美玉 (1873-1954) 入密西根大學醫學院。		
一八九五	甲午戰爭爆發，受張之洞邀返國。建議實施新政，受劉坤一任命為江南交涉員。後至上海自營辦事處。			
一八九六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喜納治五郎協助唐寶鐸、胡宗瀛、賤翼翬等十三人抵東京（中國最早留日學生）。		
一八九七	赴北京，提議建立國家總銀行等新政。	第四屆留歐學生赴法，共六名。受經費影響，未能完成學習計畫。		
一八九八	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離北京。	戊戌變法後，留學計畫由歐美轉為日本優先派遣。		
一九〇〇		留日人數約二〇〇名。		服部宇之吉留德。
一九〇〇	於上海組織「中國議會」遭查緝後逃往日本，與孫中山同船。後避香港，傾向革命派。			夏目漱石留英。
一九〇二	赴美定居。	飭令各省選派學生赴歐留學。		
一九〇三		留日人數大約是一三〇〇名。京師大學堂十六人留歐。江南水師學堂八人赴英學駕駛。陸師學堂八人赴德習陸軍。湖北各學堂共九人留德、四人留俄、二十四人留比。廣州學務處二人留歐。		

一九〇四		《游學西洋簡明章程》。 四川十三名官員赴比習路礦、二十名赴歐美習機器製造。湖南三人赴比習路礦。山西二十三人赴英習路礦。 丁文江赴英國學習地質。		
一九〇五		廢科舉。 江蘇六人赴英習駕駛。商部一〇〇人赴比習路礦。京師譯學館五人赴英、德、法、俄。		
一九〇六		新疆伊犁二十人留俄。袁世凱以天津關稅，選五人留比、五人留德。法政府提供三〇〇〇法郎由清廷派二人留法。 留日人數八〇〇〇名左右（高潮）。		
一九〇七		十二月，羅斯福退還部分庚款，留美學潮再現。 陸軍部與法國商定每年十五人入陸軍大學。 江蘇十九人留奧。德國柏林東文大學聘四名中國學生教授漢語。 蔡元培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		
一九〇八		浙江二十人留歐美		
一九〇九	在美與孫中山會晤表示支持。 出版英文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	第一批庚款學生程義法、金濤、梅貽琦等四十七人赴美。		
一九一〇		郵傳部十二人赴奧習郵政。		

一九一一	辛亥革命成功，致信「致全體革命者」祝賀。	浙江二十人赴英、德、法、比。		
一九一二	受孫中山力邀回國，因病未成行。四月二十一日逝世，葬於美國哈特福德市西郊雪松山公墓。	李慶安、張秀波、齊雲卿在巴黎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		

【註】 本表關於中日留學生史的部分，係參照下列研究整理而成：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田正平主編：《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石附實：《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學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72年）。

西學之子

——容閔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

陳瑋芬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日本經歷了漫長的海禁，正待甦醒時，容閔和新島襄迫不及待打了前鋒，前往美國新英格蘭地區完成大學和研究所學歷，成了中日的留美先驅。他們都偏離東方社會的主流——科舉、武家——規範，但處身於社會的底層、邊緣、夾縫，容閔見證了清末到民國的改朝換代，新島則見證了幕末到明治前二十年的思潮激變。

本文由「東方與西方」、「前近代與近代」、「宗教和國家認同」、「公意與私情」的對比，取異域、跨界和認同的主軸，探討容閔與新島襄相近的異國經驗及其文化認同問題。並將二人置於中、日留美學史予以定位，並分析中、日由師夷之長到送出公私費西學之子的過程中，展現的國民性差異及文化特性。

關鍵詞：容閔 新島襄 留學生 近代化 東亞 文化認同

Son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eign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Cases of Yung Wing and Joseph H. Neesima

CHEN Wei-fe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and Japan had experienced long periods of “Prohibited Sea Policy.” It was just as if the two countries had experienced a hundred-year sleep and were waiting to be awakened. It was then that Yung Wing and Joseph H. Neesima both left their countries, and went to New England for their 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becoming trailblazers for those who followed them to North America for education. They left the mainstream of East Asian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such stern traditions as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Japanese Military Family Culture. After immersion in a western society during much of their young adulthood, they were somewhat marginalized when they returned to their native countries, and hampered in their careers as a result of their foreign experience. How did Yung and Neesima view the changes in their native countries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ir lifetimes, for Yung,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for Neesima the ideological cataclysm from the end of the Tokugawa to the Meiji period?

This paper explores concepts such as “East and West,” “pre-modern and modern,”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public meanings and private feelings,” to compare the foreign, boundary crossing, and identity. From practicing the strategy of “learning from the strengths of the foreign invaders” to opening minds to the West, the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 experiences of Yung Wing and Joseph H. Neesima. Second, it analyzes how intellectuals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nationalism when encountering cultural conflict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China-Japan overseas study,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experience of studying overseas reformed national education, and what roles these two men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Yung Wing Joseph H. Neesima modernization
East Asia cultural identity

徵引書目

- 王奇生：《中國留學生的歷史軌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
- 《幼童·五集電視紀錄片》，深圳：深圳音像公司，2004年。
- 石霓：〈中國留學生之父——一個孤獨的邊緣人〉，收入吳文萊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廣州：珠海出版社，1999年。
- ：《觀念與悲劇：晚清留美幼童命運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容閔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年。
- ：《容閔評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田正平編：《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
- 李志剛：《容閔與近代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81年。
- 李細珠：〈「邊緣人」的角色尷尬——容閔在晚清中國的人生境遇〉，收入吳文萊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廣州：珠海出版社，1999年。
- 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 、劉集林等：《近代中國的留美教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汪一駒著，梅寅生譯：《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臺北：久大文化公司，1991年。
- 林家有：〈論容閔的報國心〉，收入吳文萊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廣州：珠海出版社，1999年。
- 容閔：《西學東漸記》，收入《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
- ，王綦譯：《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容應英：〈容若蘭是容閔的兒子嗎？〉，《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291-304。
- 張文驪：《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閔》，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
- 許焯光：《美國人與中國人：兩種生活方式比較》，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
- 黃順力：〈容閔與近代「教育救國」的思想和實踐〉，吳文萊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廣州：珠海出版社，1999年。
- 鄧麗蘭編著：《臨時大總統和他的支持者——孫中山英文藏檔透視》，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
- 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第一批官派留學生》，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年。
- 戴學稷、徐如：〈論容閔的愛國主義其貢獻及其歷史地位〉，收入吳文萊主編：《容閔與中國近代化》，廣州：珠海出版社，1999年。
- ：〈愛國華僑學者容閔（上）〉，《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季刊》1982年第1期，頁3-12。
- 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 Thomas LaFargue 著，高宗魯譯註：《中國幼童留美史：現代化的初探》，臺北：華欣文化事

- 業中心，1982年。
- 小澤三郎：《幕末明治耶穌教史研究》，東京：亞細亞書房，1944年。
- 山口宗之：〈橋本左内・横井小楠——反尊權・倒幕思想の意義と限界〉，收入《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十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
- 中濱東一郎：《中濱萬次郎傳》，東京：富山房，1926年。
- 井上勝也：《國家と教育——森有禮と新島襄の比較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00年。
- 内村鑑三：〈新島襄論 新島先生の性格〉，《中央公論》1970年11月號，收入《同志社談叢》vol. 17，1997年3月，頁236-266。
- ：《内村鑑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32-1933年。
- 太田雄三：《新島襄——良心ノ全身ニ充滿シタル丈夫》，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年。
- 石附實：《近代日本の海外留學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72年。
- 北垣宗治編：《新島襄の世界——永眠百年の時点から》，京都：晃洋書房，1990年。
- 本井康博：《新島襄の交遊》，京都：思文閣，2005年。
- 同志社社史史料編集所編：《同志社百年史資料編二》，東京：同志社，1979年。
- 同志社編：《新島襄——その時代と生涯》，京都：同志社，1993年。
- ：《新島襄生誕一五〇年記念寫眞集》，京都：晃洋書房，1993年。
- 百瀬弘譯注：《西學東漸記 容閔自傳》，東京：平凡社，1969年。
- 佐久間象山：《省響錄》，收入《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十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
- 岩村清四郎：《新島襄言行錄》，東京：三省堂，1939年。
- 武田清子、吉田久一編：《新島襄集》，東京：筑摩書房，1977年。
- 和田澤一：《新島襄》，東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73年。
- 根岸橘三郎：《新島襄》，東京：警醒社，1923年。
- 森中章光：《新島襄先生の生涯——教育報國篇》，東京：泰山房，1942年。
- 植村正久著，佐波亘編：《植村正久と其の時代》第三卷，東京：教文館，1976年。
- 湯淺與三：《新島襄傳》，東京：改造社，1936年。
- 新島襄：《人生讀本》，東京：第一書房，1938年。
- 新島襄全集編集委員會編：《新島襄全集》，京都：同朋舍社，1983-1996年。
- 實藤惠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收入《中國人近現代教育文獻資料集》，東京：日本圖書，2005年。
- 學校法人同志社編：《新島襄：近代日本の先覺者》，東京：晃洋書房，1993年。
- Bird, Isabella L.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Including Visits to the Aborigines of Yezo and the Shrine Nikkō*, 2nd ed. London: J. Murray, 1911.
- Britton, Roswell S.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3.
- Hardy, Arthur Sherburne. *Life and Letters of Joseph Hardy Neesima*.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1902.

- LaFargue, Thomas 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ambert, Tony. "The Gutzlaff Affair: A Warning from History." *China Insight Newsletter*, July/August (2004), (<http://www.us.omf.org/content.asp?id=37216>).
- Lanman, Charles. *The Japanese in America*. London: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72.
- Latourette, Kenneth Sch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Lee, Bill Lann. "Yung Wing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 *Amerasia* 1.1 (Mar. 1971): 27-28.
- Shore, H. N.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81.
- Wing, Yu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09.
- Wong, J. Y. "Three Visionaries in Exile: Yung Wing, K'ang Yu-wei and Sun Yat-Sen, 1894-1911."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0.1 (1986): 18-21.
- Y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